

北大高等教育研究:学科发展与范式变迁

陈洪捷

(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本文从学术史的视角,对北京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在最初的大约15年中,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以比较研究为主,形成了以国际的视野、跨学科的路径、实证的态度和方法上的多元性等为特点的研究风格。在知识分化和组织变迁的双重作用下,北京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转型的趋势,主要表现在逐步有意识地超越原来的比较教育研究范式,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基础、问题意识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深层对话。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近30年的发展历史体现了知识分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对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知识自主性提出了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高等教育学需要建构独特的理论话语、知识体系和分析方法,并依靠这种自主的“核心知识”提出不同于经验知识的问题解决方案。

关键词 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学;范式变迁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68(2010)04-0002-10

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在世界范围不过五六十年的历史。中国起步较晚,大约在30年前开始形成自己的高等教育研究。虽然各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具有许多共同的研究问题和知识资源,但其学科定位以及在大学结构中的地位却很不相同。比如高等教育学在目前中国的学科体系中,属于教育学中的二级学科,在大学中具有相应的职位、培养计划和学位;而在许多国家中,高等教育只是一个研究领域,并不构成一个学科。这些外在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高等教育学在知识构成与知识系统层面的复杂性。

众所周知,在以学科为基础的高深知识体系中,任何新兴的知识领域都试图建立自己的学科边界和知识系统,确立自己的学科地位。这些通常对于这一领域知识的积累与发展、知识的传承与创新以及专业学术认同的建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就中国的高等教育学而言,在过去的30年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本身的学科地位、知识结构、理论与方法等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但这些问题没

收稿日期:2010-08-10

作者简介:陈洪捷,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

本文的写作得到陈学飞、马万华和沈文钦等同事的帮助,特此鸣谢。

有得到解决,反而由于高等教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而显得更为复杂。

北京大学是中国开展高等教育研究最早的单位之一,其发展历程或多或少能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学整体的发展过程。本文将从学科发展和研究范式的角度,分析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学的历史,也希望通过这一案例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有所贡献。

一、初期的探索与研究路径

北京大学的高等教育学是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同步产生的。中国高等教育学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的兴起,有两个因素不可忽视。一个是比较教育学的复兴与繁荣,一个是高等教育地位的空前提高。这两个因素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的超常发展、并很快获得制度认可的学科地位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封闭多年之后,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从封闭走向开放,了解、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种种经验就成为当务之急。特别是在文革中受破坏比较严重的教育领域,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成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长期地位不高的比较教育学(其实主要是国别教育研究)迅速恢复,并受到普遍的关注。1979年,外国教育研究会成立。同年,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开始在全国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教育动态》(1991年更名为《比较教育研究》)和东北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教育研究》也先后复刊或正式公开发行。在研究课题的资助中,比较教育也受到特别的重视。例如,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六五”课题中的12个方向中,比较教育类的课题占了7项,仅次于高等教育方向(8项)。应当说,当时的比较教育不仅是一个学科,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态度,一种开放与学习的态度。这与当时全国的改革开放气氛也是一致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高等教育面临恢复与发展的新契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随着恢复高考以及高等教育社会地位的提高,整个高等教育发展面临各种各样亟待回答的问题。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学或高等教育研究成为一个新兴的、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许多大学纷纷建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所,展开高等教育研究。据说,在1980年代中期,全国有600余家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并出版有大量的高等教育研究一类的学术期刊。高等教育研究受到如此之重视,这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的高等教育研究刚刚兴起,多数学者从各种不同的学科转入,不少研究主要基于经验。研究的问题与实践中的问题密切相关,不少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直接隶属于大学的行政部门,可以看作学校决策的咨询和服务部门。新兴的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跟踪和介绍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状况,以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提供依据和借鉴。

北京大学1980年建立了高等教育研究室。这一研究室是从当时北大党委政策研究室中衍生建立的,与学校的党政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随着高教室的建立,其研究兴趣很快就脱离了大学内部的具体问题,转向关注全国乃至国外的高等教育发展状况。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在原来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这是中国最早的高等教育研究所之一,也是最早获得高等教育学硕士点(1983年)和高等教育学博士点(1990年)的单位之一。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受到当时比较教育和高等教育研究趋势的影响,主要从比较教育的视野出发,针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展开研究。高教所进行的第一个大型研究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六五规划项目“中国高等教育结构问题研究”)就是关于西方若干国家高等教育结构的比较研究。在汪永铨的主持下,课题组对美国、法国、前苏联、日本和德国近百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和层次结构进行了宏观比较研究,其目标就是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和层次结构的调整提供依据。^[1]

高教所最初教师的专业结构也显示了比较研究的倾向,当时招聘有专门研究美国、前苏联、法国、德国、日本、英国的研究人员,形成了一支进行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队伍。在比较高等教育的视野下,高教所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比较性研究,除了以上提到的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和层次结构比较研究之外,还进行了“美国、德国、法国、苏联高等教育管理比较研究”(七五规划项目)、“英、法、德、苏、美高等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八五规划项目)、“中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五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比较研究”(九五规划项目)等。根据当时研究的取向以及研究队伍的构成,当时不少研究者具有外语的专业背景,他们虽然掌握外语和对象国家文化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对于开展跨学科的高等教育研究贡献是有限的。从当时全国高等教育研究状况看,研究者的知识基础多以普通教育学和比较教育学为主;北京大学的高等教育则缺乏这种基础,同时也不主张把高等教育学研究建立在普通教育学的框架基础之上,而认为高等教育学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知识基础。

当时正值管理学在中国兴起,其理论对于高等教育研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北京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就曾试图借鉴管理学的相关理论搭建高等教育的研究框架。与此同时,高教所的学科带头人汪永铨教授尝试以系统论为基础建立更为宏观的高等教育学理论,为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高教所虽然以高等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为主,但并没有局限于当时流行的比较教育的范式,不以跟踪介绍国外教育发展为主要目标,而是力求从问题出发、以比较为手段,回答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与此同时,高教所十分重视利用北京大学学科比较齐全的优势,尝试与校内相关的学科合作开

展高等教育研究,比如与经济学合作,开设教育经济学课程,从事教育经济学研究,与管理科学合作进行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研究,与法学合作开展高等教育立法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开拓性的成果。但应该看到,当时由于高等教育学刚刚兴起,其学科地位也未得到足够的认可;与此同时,在相关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史学乃至管理学中,高等教育问题受关注的程度还非常有限。因此,从两方面看,进行跨学科的高等教育研究,当时的条件显得不够成熟。

在注重跨学科高等教育研究的同时,北京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特别重视研究方法的改进与提高,注重实证和定量的方法,强调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的结合。北京大学早期的高等教育研究比较注重比较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闵维方1989年来所工作后,定量统计的方法逐渐普及开来;1994年,陈向明从哈佛归来,加入北京大学教育研究团队,带来了让国内学界耳目一新的质性研究方法。至此,北京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将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定量研究法、定性研究法融为一炉,形成了注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多元的传统。仅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为中国高等教育、乃至教育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总之,在最初的大约15年中,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处于探索阶段,以比较性研究为主,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结构、管理以及思想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同时注重与其他学科的合作,吸收不同的研究方法,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这种风格可以大致概括为:国际的视野、跨学科的路径、实证的态度和方法上的多元性。

二、学术转型与新范式

20世纪90年代末,北京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出现了转型的趋势。导致转型的因素有组织方面的和知识方面的,而更主要是知识方面的因素。

在组织方面,高教所内部的结构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变化。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实力不断加强,先后上升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年)和全国重点学科(2002年)。同时随着学科目录的调整,教育经济与财政、高等教育的组织与管理两个方向被划入公共管理学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2000年教育学院成立之后,出现了教育与人类发展系、教育经济与管理系和教育技术系三系并列的格局,各个方向独立的倾向更加突出。与此同时,学术队伍也在迅速扩大,2000年后引进的教师有19位之多,这使得教育学院从一个小型的学术手工作坊演变成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研究团队。而且新进人员具有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管理学、心理学和法学及高等教育学等不同的学科背景,他们的到来一方面丰富了学院研究的学科视角,另一方面也对既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

与组织因素相比,知识因素的影响显得更为深刻。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

下,高等教育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比较教育无论作为一个学科,还是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其重要性逐渐在下降,并出现了一些衰落的征兆。首先,一些原先活跃在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学者开始转移战场,到其他研究领域谋求发展;其次,由于其他教育研究领域的学者越来越多地采取比较的方法,比较教育学者的身份开始变得模糊,产生了学科认同的危机。^[2]因而,毫不奇怪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比较教育学的危机成为国内教育学界常谈常新的问题。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研究面临的问题日益趋于多学科化,并与相关的学科建立了多种联系,或者说,随着高等教育研究的日益深入,更多地需要相应学科的支持。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也逐步有意识地放弃了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式,在原来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基础并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的深层对话。

在研究课题方面,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人员不再主要从事国别性的比较研究,而是从不同的学科或问题角度,针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原有的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也相应开始分化,形成了若干特点鲜明、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研究方向,逐渐形成了以经济学和财政学为支撑的教育经济与财政研究方向、以管理学为基础的高等教育管理方向和以政治学和政策学为基础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方向。另外还形成了两个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向,一个是国际化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一个是知识与高等教育研究。前者仍以比较教育为主要学科基础,后者则主要以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哲学为学科基础。

如上所述,由于教育经济与管理被划归公共管理门类,教育经济和管理方向已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关于这两个方向的发展,另有专文讨论),北京大学现有的高等教育学实际上主要包括高等教育政策、国际高等教育和知识与高等教育三个主要方向。以下对此三个方向作简要说明。

(一)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研究从一开始就与政策研究密切相关,大量的研究属于政策研究的范畴,而且为决策提供依据也是高等教育研究所声明的重要目标。但是,早期的研究虽有政策研究的意识和愿望,但缺乏政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同时,随着高等教育研究本身的发展,有关决策部门对高等教育研究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些都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浏览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历次的课题立项目录便可知,直到“八五”规划(1991~1995)为止,我国立项的教育类课题中出现“政策”两字的还寥寥无几。这一状况到“九五”规划(1996~2000)时有了明显改观。

正是在“九五规划”时期,陈学飞从比较教育研究开始逐渐转向教育政策研究,并组织开展有关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政策文本以及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等方面的研究。北京大学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强调“理论导

向的经验研究”。这里的经验是指实然的教育政策现象;这里的理论一方面是指来自政治学等社会学科已有理论的运用和检验,另一方面则强调在对实然教育政策现象研究的过程中本土概念和理论的构建。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政策研究这一方向希望在借鉴已有政策科学理论、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对本国教育政策现象的研究来积累知识,探索并努力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以此提高教育政策研究的水平。

(二)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方向

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是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学学科的传统优势领域,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做了大量的国别研究,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介绍和引进的成分多一些。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发展,国际高等教育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等教育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区域高等教育整合、国际学生学者流动、国际学生管理与移民政策、知识与国际人力资源发展、信息技术与跨国教育等等,都成了国际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问题。因此,传统的以国别追踪性或评介性为主的比较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开始与具体的问题与理论相互结合起来。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高等教育原有研究方向的不断独立,北京大学的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经过调整,逐步聚焦于国际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其中包括不同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变革研究,国际化战略和高等教育系统变革研究,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与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国际比较研究,逐步形成了“问题导向型”的研究模式,即围绕国际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来研究分析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战略、政策和措施,并在问题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国际比较高等教育理论和方法建设。

(三) 知识与高等教育研究方向

如果说高等教育管理、政策、经济与财政侧重高等教育的外显结构,从知识的角度切入高等教育,则意味着探索高等教育活动的内涵性特征,探索高等教育活动中知识的地位与作用,比如知识的性质、知识传授、学术训练与知识生产的过程。在北京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中,这一研究方向以知识的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和哲学研究为基础,横向上依托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等学科基础,逐渐形成一个内容丰富的研究方向。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对知识的关注,由来已久。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围绕通识教育开展研究,从90年代末以来,随着知识社会进程的推进,知识与高等教育的关系逐步成为一个研究的重点。其中一个重点是博士生教育,侧重研究知识生产方式变化对研究生阶段学术训练的影响,以及学术制度、学科制度等相关问题。这一研究方向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在知识社会中,知识的应用、传承与生产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整个高等教育发生了何种影响。

相对而言,这一方向的研究更具有基础研究的性质,其直接的应用价值不是很明显,但所涉及的问题对于理解整个高等教育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以知识为基础的高等教育研究也会有助于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建设。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虽然形成了不同的重点或方向,但从研究的风格与范式上看,还是显示出许多共通性。如上所述,早在发展的初期,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即国际的视野、跨学科的路径、实证的态度和方法上的多元性。只是这种风格在前期和后期的内涵有所不同,特别在跨学科和国际视野方面,前后两个时期有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显然也反映出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的进步。

首先,关于跨学科研究。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在一开始就非常注重跨学科的合作,并在跨学科高等教育研究中做出了最初的尝试,试图通过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合作来扩大高等教育研究的领域。但限于当时的种种条件,跨学科的研究主要以借外力为主,通过合作的方式来研究共同的问题。而随着自身研究队伍的扩大和专业背景背景的多样化,跨学科研究已经进入到自己的研究队伍之中,渗透到整个高等教育研究过程之中。

其次,关于国际视野。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历来注重国际的交流,但限于各种条件,当时的研究以引进、借鉴为主,走“拿来主义”的路线;而后期的国际合作则明显不同,更多的是通过直接参与国际合作课题的方式进行,而且国际合作的对象也日趋多元。特别从研究问题方面看,自身的研究通常与国际同行的相关研究日趋同步,参与到国际研究主流之中,并能从中国的视角为国际性研究作出贡献。

三、问题与展望

在过去的30年中,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在发展与探索的同时,在学科建设和知识整合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展望未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和高等教育学的发展,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学仍面临不少挑战,有两个问题尤其值得注意:一是知识分化问题,一是知识自主性问题。

(一) 关于知识分化

回顾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3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知识分化的趋势。如上所述,最初在高等教育名义下进行的教育经济学或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逐步独立出来,其他三个研究方向也显示出相互独立的趋势。其共同趋势是,各个方向越来越走近他们所依托的学科,并强调其独立性,试图在努力获得新依托学科的认可。比如教育经济学更倾向于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高等教育管理也更倾向于运用管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教育政策研究更倾向于运用政策学的理论与方法。这意味着,这些独立的研究方向在学术认同方面有脱

离高等教育学的趋势。

如果说高等教育只是一个研究领域的话,各相关学科参与其中,但不脱离原来学科、不放弃其原有的学科认同,应该说不存在任何问题。正如在西方许多国家那样,高等教育被看做一个研究领域,无需讨论其学科地位。但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或高等教育学在形式上早已具备了一个学科的特征,比如具有相应的硕士和博士培养计划、相应的专业期刊和学术组织。这样,高等教育既然是一个被认可的学科,但又缺乏相应的学科认同和共同的学术范式,那么这个学科就有明显的缺陷。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30年的历程显示,高等教育研究越是走向深入,就越需要不同相关学科的支持;而高等教育越是走近相关的学科,越是与其他学科深度融合,则越是难以形成自己特有的理论和知识系统。也就是说,跨学科性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要特征,而这一特征潜伏着使高等教育研究趋于分裂的危险。如果我们不站在狭隘的学科角度看问题,这种两难境地其实并不构成问题。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的专业,与其他相关学科本来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存在的合法性应该更主要建立在其解决现实问题和对现实问题分析能力之上,而非其学科体系的完整或系统性之上。

但是,只要高等教育学要培养自己的硕士和博士,只要大学中有高等教育的教职,只要有高等教育学的学术期刊和学会的存在,那么,一个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以及共同的知识基础和学术范式与认同就不可缺少。换句话说,高等教育学如果要具备自己独特的分析和解决高等教育问题的能力,似乎应当具有相对独特的知识系统。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学近年来也提出学科整合的问题,其核心就是如何在借鉴相关学科的同时,形成高等教育学的独特的研究视野,建构独特的理论话语、知识体系和分析方法。

那么,高等教育学究竟应该沿着分化的路线继续前进,还是在分化的同时努力建立自己的知识基础与理论框架?这是摆在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学面前的一个问题,这似乎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界有待回答的一个大问题。

(二) 关于知识自主性

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得天独厚,历来享有较高的“待遇”,这可能主要归功于高等教育在中国社会中享有的特殊地位。而且高等教育研究也由于受到大学管理者和教育决策部门的重视而颇受关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最初的领导人就往往具有大学或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经历,高等教育学术组织的领导人往往也有政府官员的背景,而且高等学校中一批中高层领导也加入到高等教育研究的队伍。而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研究者较少有这种行政背景。透过这种特殊的人员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受到重视和支持的原因。

换个角度说,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管理者——高校的管理

者和教育主管部门的管理者,决策者的需求构成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基础。所以,高等教育研究往往与大学领导和教育主管部门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且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其复杂性的增加,以及决策科学化的趋势,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决策部门对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对决策咨询研究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强。这导致了高等教育研究课题的大量增加。近十余年来,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各个高等学校越来越多地委托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进行委托课题研究,或者与研究单位合作进行课题研究。这些课题一方面加强了教育主管部门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同时研究单位也获得了更多的研究课题和经费支持。北京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近十年来完成了一系列委托课题项目,其中不少是大型的项目。这些项目是高等教育研究更多地接近实践、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前提。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或者一个研究领域,不仅要面向实际、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而且还需要建设自己的知识系统和理论体系。特定的项目虽然能推动高等教育研究,但项目往往具有特定的目标和问题,如果过多地围绕项目进行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学知识的积累和理论的建构就会受到影响。跟随教育管理部门的逻辑去观察和分析问题,虽然可以拿到项目,但这样的研究可能只会在短期内受到重视,从长远看,由于缺乏独立的立场和分析路径,其成果很难为决策者和管理者真正提供有参考价值、有远见的决策依据。

近年来,北京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也开始关注研究项目与学科知识建设之间的关系,对高等教育学独特的知识与理论系统呼声也在增强。高等教育研究如果要更好更有效地为高等教育发展和相关决策服务,就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知识和分析方法,并依靠这种自主的“核心知识”提出不同于经验知识的问题解决方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课题研究具有很大的诱惑力,所以如何处理课题研究与“核心知识”开发的关系,是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今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对于整个高等教育研究界应该说也不无普遍意义。

参考文献

- [1] 郝克明,汪永铨. 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 [2] 李现平. 比较教育身份危机之研究[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 [3] 陈学飞. 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
- [4] 陈学飞. 美国、日本、德国、法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革研究[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5.
- [5] 陈学飞. 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当代高等教育思想研究[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 [6] 陈向明. 大学通识教育模式的探索:以北京大学元培计划为例[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 [7] 陈洪捷. 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8] 陈洪捷. 论高深知识与高等教育[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6, (4): 2-8.
- [9] 陈洪捷. 博士质量: 概念、评价与趋势[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10] 马万华. 从伯克利到北大清华: 中美公立研究型大学建设与运行[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 [11] 汪永铨.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几点思考[J]. 教育研究, 1999, (10): 23-28.
- [12] 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 中国博士质量报告[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13]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课题组.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14] [英] 马尔科姆·泰特. 高等教育研究: 进展与方法[M]. 侯定凯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责任编辑 李春萍)

新书预告

讲座是北大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着校内外莘莘学子和学术同行。“北大教育论坛”是北大讲座的有机组成部分,广泛邀请国内外有影响的学者就教育问题做报告,注重跨学科的视角。该论坛一般每两周举行一次,创办九年来已经发展成为国内知名、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讲座品牌。

《北大讲座》(教育卷第一辑)从2006年9月至2008年6月举行的“北大教育论坛”讲座中,精选了26场讲座的现场录音稿或文字稿,编辑成书。该书的作者包括韦钰院士、顾明远教授、闵维方教授、王英杰教授、Joop Hartog教授、Ruth Hayhoe(许美德)教授、天野郁夫教授、金子元久教授等27位著名学者,涉及教育基本理论、教育研究方法、高等教育、教育管理与政策、教育经济与财政等领域的问题,对教育领域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高校贷款、高考改革等重大热点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剖析。

《北大讲座》(教育卷第一辑)2010年10月下旬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北大讲座》系列书籍之一,也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30周年院庆系列书籍之一。

(知行 讯)

ABSTRACT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 Peking University: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Paradigm Shift

CHEN Hongjie

Page 2

Peking University is one of the pioneers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history of Peking University's research on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standpoint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the first fifteen years after its reestablishment in 1980, the research is exploratory and its basic style has been formed. Driven by the dual forces of knowledge division and organization change, the research paradigm has been changed in the late 1990s. The previous paradigm of do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mainly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as given up. W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scipline base of higher education, problem-solving capability, and the substantial dialogue between different disciplines. Totally, the trend of knowledge division is obvious, and this challenges the knowledge autonomy of the discipline of higher education. We should build on higher education's distinct theory discourse, academic system and analysis method in the futur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in Peking University: The Progress in 30 Years

DING Xiaohao

Page 12

This paper divided the progress of Economic of Education Research in Peking University into four stages: Foundation,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d Expansion.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ionships of each stage from the following dimensions: research questions, research participants, research methods, units of analysis, researchers, and relationships with policy making. This paper tried to summarize and rethink the approach of economic of education research development in Peking Univer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f academy and further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